

论数字劳动中的劳动异化问题

张美娟

(湘潭大学, 湖南 湘潭 411100)

摘要: 大数据、5G、AI 等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推动人类进入数字时代, 数字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人类主要生存和生活方式之一。“数字劳动”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的同时, 也加剧了劳动异化问题。资本逻辑通过数据商品化、算法控制和时空剥削深化了异化程度, 导致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及社会关系的四重异化。数字平台无偿占有用户数据, 算法精确管理劳动过程, 移动互联网模糊工作与生活的界限, 全球平台劳动者面临权益缺失与社会再生产危机。研究基于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 揭示数字劳动异化的新特征与根源, 为数字时代的劳动解放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 数字劳动; 劳动异化; 算法控制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36

一、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革命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演进, 互联网平台经济作为新兴经济形态, 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重构着全球劳动力市场的空间结构与运行逻辑, 成为影响国际劳动力资源配置格局的关键变量。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统计, 全球数字劳工平台工作者在 2021 年已达约 1.63 亿, 其中发达经济体占比超过 60%^[1]。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进一步预测, 到 2025 年全球独立劳动者含平台工作者规模可能扩大至 5.4 亿, 约占正式劳动力的 8-10%^[2]。“在这一变革浪潮中,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平台企业作为新兴组织形态, 正在深刻重构传统劳动关系的基本范式。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远程办公、众包劳动、零工经济等新型就业模式^[3], 这些劳动形态虽然打破了时空限制, 赋予劳动者表面上的工作自主权, 但其背后却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劳动异化危机。

在当前社会经济背景下, 研究数字劳动异化问题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理论维度看, 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使得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面临新的解释情境, 算法管理、评分机制等技术控制手段创造了更为隐蔽的劳动剥削形式; 从实践层面看,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 东南亚地区 76% 的平台劳动者缺乏正式劳动合同, 凸显全球劳动权益保护的失衡^[1]。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 数字劳动的普及化与平台化趋势使得劳动异化问题呈现出新的特征, 劳动过程的碎片化、劳动关系的去组织化以及劳动者身份的模糊化, 劳动者陷入“算法控制”与“身份悬置”双重困境^[4]。

本研究旨在揭示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异化的新特征, 为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数字劳动生态系统提供理论依据。现有研究表明, 数字劳动的异化不仅体现在劳动产品与劳动过程的疏离, 更深刻地表现为劳动者自我认同的危机和社会关系的商品化^[5], 这些问题亟需在理论和政策层面得到系统性回应。

二、数字劳动的概念之林

数字劳动研究作为数字技术与信息通信技术 (ICTs) 深度融合于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产物, 该研究的兴起与全社会对互联网产业催生的新型就业形态中劳动状况恶化问题的种种担忧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 该领域逐渐演变为学者们运用批判理论解构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新前沿, 社会各界亟需构建契合数字时代特征的劳动价值阐释体系^[6]。目前, 学界对数字劳动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共识, 但根据理论框架和研究视角的不同, 可将其划分为几个主要流派。

(一) 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视角

20 世纪 70 年代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兹在批判媒介产业资本循环机制时, 首次提出“受众劳动”这一颠覆性概念, 揭示了媒介消费行为如何被异化为剩余价值生产的隐性场域^[7]。21 世纪初, 意大利学者蒂齐亚诺·特拉诺瓦率先对“数字劳动”概念予以明确界定, 并将其纳入“非物质劳动”的理论分析范畴。特拉诺瓦指出, 数字劳动本质上是一种“无偿劳动形式”, 其通过将文化消费行为转化为具有生产性的活动过程得以体现, 具体涵盖网站

作者简介: 张美娟(200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通讯作者: 张美娟

构建、软件修订以及在线互动参与等多种实践形态^[8]。这一理论在当代恋爱游戏、乙女游戏等数字娱乐产品中得到了充分印证。研究表明,玩家在这些游戏中的情感投入和互动行为如角色养成、剧情解锁等实际上构成了新型数字劳动,通过“情感劳动双循环”机制为运营商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9]。玩家往往认为自己在进行娱乐消费,却未意识到自己同时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这种隐蔽性正是数字时代非物质劳动的重要特征。

然而,克里斯蒂安·福克斯针对该观点提出批判,主张数字劳动的范畴不应囿于非物质劳动的既有框架,而应扩展至所有依托数字技术与信息通信技术(ICTs)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脑力及体力劳动实践,也应该涵盖科技产品制造环节中的工人劳动过程^[10]。这一观点在当代数字产业链中得到充分验证,从智能手机装配线上的工人,到硅谷的程序员,再到社交媒体内容审核员,都构成了数字劳动体系的不同环节,特别是中国数字产业链尤为典型,呈现为从硬件制造到内容处理的劳动分层体系^[11]。特别是在全球化生产网络中,发展中国家电子工厂的工人虽然从事着传统的物质劳动,但其劳动产品如芯片、显示屏等却是数字经济的物质基础,体现了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辩证统一。

从《大同世界》的理论视角来看,数字劳动的发展印证了哈特和奈格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形态转型的核心论断。他们的“生命政治劳动”概念揭示了数字时代劳动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延续着传统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这体现在全球电子产品供应链中从稀土开采到硬件组装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又不断将情感交流、知识生产和社交互动等非物质劳动纳入资本积累的轨道,典型表现为社交媒体用户的数字足迹如何被平台资本化。这种劳动形态的扩张与《大同世界》预言的“大众智能”普及相呼应,劳动者的认知能力和社交网络都成为新的剥削对象。

(二) 性别与劳动政治视角

部分学者将数字劳动与性别议题相结合,揭示其隐含的权力不平等。泰博·肖尔茨提出,相较于传统劳动形态,数字劳动常被视为认知盈余的消耗过程,其特质在于缺乏可感知的实体形态与视觉表征。这种特性使数字劳动在本质属性上与某些隐性的传统女性劳动形式如育儿照料、家务操持呈现出显著的相似性,均表现为难以直接量化的情感投入与隐性劳动付出,数字劳动的隐性特质使其与传统的无偿家务劳动形成结构性呼应^[12]。数字劳动问题的思考与社会性别分析紧密交织在一起,通过批判社会性别权力等级结构和反思全球媒体组织中的性别不平等,深刻地揭示出女性数字劳工所遭受的多重宰制。莱斯利·谢德和尼基·波特通过对孟加拉国女工的研究,孟加拉国数字女工在技术赋能的表象下承受着工资克扣、技能剥夺和身体规训的三重压迫,进一步揭示了全球数字产业链中女性劳工所遭受的多重剥削^[13]。出版业数字化转型中,女性编辑面临技术监控与情感劳动的双重压迫,曹晋和格雷厄姆·默多克对中国出版业女性编辑的研究也表明,数字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亟需关注^[14]。

在性别维度上,数字技术的发展并未消解传统的性别分工,反而以“数字家务劳动”的新形式延续并强化了这种不平等,从在线客服的情绪管理到直播表演的情感劳动,女性在数字领域的劳动参与仍然面临着独特的剥削机制。

(三) 中国本土化研究视角

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数字化的双重驱动下,处于社会转型关键阶段的中国社会正遭遇数字劳工群体急剧扩张的现实情境。正如乌尔里希·贝克等学者所阐释,中国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时空压缩”的独特性特征,既承载着传统工业化阶段也就是第一现代性的制度惯性,又面临着后工业时代也就是第二现代性的范式冲击,形成双重现代化压力的共时性困境^[15]。虽然现阶段尚不能断言数字劳动已占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导地位,但劳动过程的数字化转型所引发的结构性变革效应已然显现。国内学术界基于本土化研究范式,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对数字劳动概念展开了多维度阐释。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为根基,深入剖析数字劳动领域的核心议题,具体涵盖劳动关系的形态演变、劳动过程的组织逻辑、劳动力再生产的机制重构、劳动者自我认知的转型路径以及劳动者团结策略的革新维度。姚建华将数字劳动定义为涵盖 ICTs 和数字技术产业链上所有劳动形式的集合,包括硬件制造、软件开发以及用户的生产性消费行为^[16]。

谢芳芳和燕连福则借鉴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数字劳动的“产消合一性”与“情感性”特征^[16]。黄再胜的学术立场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主张一致,他指出数字劳动本质上是依托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实现协同运作的非物质化劳动形式,其显著特征体现为劳动主体的个体化、劳动过程的娱乐化以及劳动体验的沉浸化。具体而言,该劳动形态囊括了社交媒体场景中的无偿内容生产、网络平台环境下的碎片化任务执行,以及网约经济模式中的在线服务提供^[17]。

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轨迹尤其凸显了劳动异化这种矛盾的现代性特征,既孕育着高度技术化的平台经济,又保留着前现代的劳动控制方式,这种混杂性恰恰印证了哈特和奈格里对当代资本主义“帝国”形态的判断,也为探索数字时代的劳动解放提供了独特的实践场域。

数字劳动的概念界定因理论视角不同而呈现多元性,但其核心均围绕劳动形式、生产关系与社会权力结构展开。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厘清不同流派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以深化对数字劳动的理论认知。

三、数字劳动异化新表现

要探索当今数字劳动异化的新表现,就要“却顾所来径”,回头看看传统劳动异化的表现。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迅速发展,机器大生产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劳动,工厂制度逐渐建立,工人阶级的数

量急剧增加。然而,随着生产力的提升,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贫富差距拉大,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恶劣,劳动时间长,但工资低,且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

新的生产技术促进了资本积累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得生产过程更加高效,同时也导致了大规模的生产集中和垄断现象。资产阶级作为新兴的统治阶级掌握了大量的资本和生产资料,而工人阶级则成为了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在资本规训与生存压力的双重挤压下,劳动者被迫将自身劳动能力转化为可计量的商品化存在,通过出让其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以获取仅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货币等价物。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开始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并试图从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问题,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理论的构建,建立在对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之上。国民经济学派将所有有利于资本增殖的实践路径予以理论化包装,通过意识形态规训使劳动者形成对资本剥削的合法性认知,进而导致劳动者主体性的现实性消解。这种理论范式将人异化为资本的附庸,使劳动者沦为非具身化的抽象存在,恰如该学派将劳动者的创造性实践简化为纯粹的抽象劳动过程一般^[18]。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构建的劳动异化批判范式,通过系统性解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生产活动、类本质规定性及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四重断裂机制,揭示了资本逻辑主导下主体性消解、价值生产倒置与社会关系物化的深层异化结构。而在当今数字时代,这些异化形式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呈现出新的特征和更深程度的异化表现。

(一) 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

在工业革命后的工厂制度中,工人生产的物品越多,就越失去对这些物品的控制。他们所创造的产品不仅不是他们的财富,反而成为了统治和剥削他们的工具^[10]。在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支配下,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的占有关系发生根本性断裂,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通过体力与脑力支出凝结的商品化劳动成果,在价值实现环节被资本所有者通过物权占有机制强行剥夺,导致劳动者既无法在物质层面支配其生产物,工人无法享受其劳动成果。

在数字资本主义下,用户(劳动者)通过在线平台产生的数据、内容等数字产品,如社交媒体上的帖子、评论、点赞、浏览记录等,都被平台无偿占有。这些数据经过算法分析后,可以转化为有价值的资产,用于广告投放、个性化推荐等商业目的,而用户通常对此缺乏意识或控制权^[19]。数字劳动者生产的数据、内容等数字产品,不仅像传统工人那样失去对产品的控制权,而且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正在生产有价值的产品。

用户生产的数字产品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但创作者往往无法直接从这些产品的商业化中获益,社会加速使数字创作突破时空限制,却未改变价值分配的殖民性结构^[20]。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算法将用户生成的内容(UGC)转化为广告投放的依据,用户的情感表达和社交互动被资本化,成为平台盈利的工具。这种商品化过程不仅剥夺了用户对自身劳动成果的控制权,还加剧了数字劳动的无偿性和隐蔽性。

(二) 工人与劳动活动的异化

工厂劳动对工人而言已异化为生存性强制活动,其劳动行为不再构成主体性展开的实践场域,而是异化为资本增殖逻辑驱动下的功能性服从,沦为维系肉体存续的外在手段。劳动过程被重构为资本权力对劳动者身体与时间的强制性征用,工人唯有在劳动间歇的短暂间隙中方能短暂复归生命自主性,而劳动本身则沦为束缚其自由意志的异己力量^[18]。劳动过程机械化、重复性强,工人失去了对劳动过程的掌控,劳动变成了单调乏味的体力消耗。

数字劳动者的工作环境看似更加灵活,许多工作可以在家中或任何有网络连接的地方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更加自由。相反,数字劳动的时间和空间界限变得模糊,劳动者可能随时随地处于“在线”状态,导致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模糊化^[21]。

数字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也受到算法和技术的严格控制,平台算法通过对劳动过程的精确控制和实时监控,以“数据闭环”的方式实现了劳动异化的技术升级,这是比传统工厂更彻底的劳动过程异化^[22]。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平台劳动者的工作节奏由平台算法决定,他们必须遵循平台设定的任务分配和时间表,失去了对劳动过程的自主性^[23]。数字劳动的无形性和虚拟性使得劳动者难以直观地感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劳动过程变得更加抽象,进一步加剧了异化感。

(三) 工人与人类本质的异化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本质在于能够自由地、有意识地创造,但异化劳动使工人失去了这种能力。工人的劳动不再是他个性的表现,也不再是他的生命活动的肯定,而是变成了否定他自身的一种活动^[10]。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劳动过程被异化为机械化的重复性操作,劳动者丧失了创造性潜能、自主性空间以及个性化表达的可能路径,劳动实践演变成为一种外在于劳动者本真的、具有强制约束性的异己活动。

在数字劳动中,劳动者虽然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创造性的活动,如编程、设计、写作等,但这些活动往往受到平台规则、算法限制和市场需求的制约。劳动者在创作过程中可能会感到自己的创造力被压抑,甚至被迫迎合市场或平台的要求。数字劳动看似提供了更多创造性空间,实则通过平台规则和算法限制,使劳动者的创造力被框定在特定范围内。就像自媒体创作者必须迎合平台算法偏好和流量逻辑,其创作自由受到严重制约^[24]。

数字劳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趋势也削弱了劳动者的自主性和控制权。许多数字工作者需要依赖特定的软件工具或平台来完成任务,而这些工具的设计和函数是由资本家或技术公司决定的,劳动者只能被动接受^[23]。数字劳动的虚拟性和匿名性可能导致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逐渐失去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尤其是在社交平台上,用户的身

份往往是碎片化的、多变的,这进一步削弱了劳动者的主体性^[21]。

(四) 工人与其他工人之间的异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之间的关系被商品交换和社会分工所扭曲,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和敌对。每个工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形成了竞争而非合作的关系^[10]。工厂中的劳动分工使得工人之间的协作机会减少,工人之间的联系被割裂,个体之间的合作和支持关系被商品交换和社会分工所取代。

数字平台通过评价系统和排名机制,将这种异化推向极致,劳动者之间不仅像传统工人那样存在竞争关系,而且这种竞争被平台算法精确量化和实时呈现^[25]。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算法权力架构下,零工从业者如自由职业者、网约车司机、即时配送员等被迫卷入以平台算法为仲裁者的“数字竞标赛”,其劳动定价权与生存资源分配完全让渡于智能合约的动态定价机制,导致个体间的竞争异化为基于数据绩效排名的绝对零和博弈,并最终在平台资本的“赢家通吃”逻辑中沦为可替代的算法冗余单元。平台通过算法优化任务分配,鼓励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合作^[23]。

尽管数字社交媒介与网络服务平台拓展了人际互动的时空边界,但这种技术中介的交往模式反而强化了社会关系的疏离化。在虚拟化社交场景中,个体间的联结往往呈现浅层化、即时性的特征,难以形成具有情感深度的社会纽带。此外,平台上的评价系统和排名机制进一步强化了个体之间的竞争,劳动者为了获得更好的评价或更高的排名,可能会牺牲彼此的合作精神^[21]。

数字劳动的全球化使得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跨越了国界,全球范围内的劳动者都可能在同一平台上竞争有限的工作机会,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的脆弱性和不安全感。

数字劳动还催生了马克思时代所未见的异化新形式,劳动时间的无限延伸,移动互联网使劳动者处于“永远在线”状态,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被彻底打破^[22]。劳动空间的虚拟化,远程工作虽然突破了地理限制,但也使劳动者陷入社交孤立的困境。还有就是产消合一的异化,数字劳动者往往同时是生产者 and 消费者,这种双重身份使异化更加隐蔽和难以察觉。

这些新异化形式的出现,印证了马克思关于“机器体系将劳动从属推向极端”,异化劳动将随资本主义发展而深化的预见^[26]。数字技术不仅没有消除异化,反而为资本提供了新的异化手段,使异化程度更深、范围更广、形式更隐蔽。要克服数字劳动异化,必须回归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批判维度,在数字时代探索劳动解放的新可能。

四、数字劳动异化问题的根源与影响

(一) 根源分析

数字劳动异化的本质根源在于资本增殖逻辑在数字时代的深化发展。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在当代平台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资本逻辑通过数据剥削机制表现得更为隐蔽而深刻。数字平台构建了全新的剥削体系,以算法控制为核心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精确管理。根据2018国际劳工组织对东南亚骑手的调研,外卖平台的智能派单系统将骑手的劳动强度精准控制在生理极限边缘,剥削率高达37.2%。

数据商品化进程创造了资本积累的新维度。祖博夫提出的“监视资本主义”理论揭示,平台企业通过无偿占有用户数据实现价值攫取^[27]。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例,用户日常互动产生的海量数据被转化为精准广告投放的基础,2021年仅Facebook就从中获取1149亿美元广告收入。这种剥削的隐蔽性在于,数据生产者既无法控制数据的商业用途,也难以获得合理回报。同时,移动互联网技术打破了传统的工作时空界限,使劳动者陷入“永远在线”的困境。2021国际劳工组织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数字创意工作者每日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近八成需要在非工作时间处理工作消息,这种时空剥削极大拓展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范围。

(二) 影响探讨

数字劳动异化正在重塑当代社会经济格局,其影响呈现出复杂的多维特征。在个体层面,平台通过将劳动者定义为“独立承包商”的制度设计,成功规避了传统雇主责任,导致全球范围内仅13.2%的平台工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险^[23]。这种“去劳动关系化”策略使劳动者陷入前所未有的保障缺失状态,工作不安全感显著加剧。在市场结构方面,数字平台的高度集中催生了新型垄断形态,五大科技巨头掌控着全球四分之三以上的云服务 and 在线广告市场^[28],这种垄断地位使其能够单方面制定有利于资本积累的规则,如应用商店高达30%的佣金抽成实质上构成了数字时代的新型地租^[2]。

数字劳动的全球化配置虽然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即时连接,但也强化了中心-边缘的不平等结构。跨国比较研究显示,数字平台上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报酬普遍仅为发达国家同行的五分之一^[29],这种全球性的“竞次”现象进一步固化了国际分工中的不平等关系。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数字劳动对生活时间的过度侵占正在引发社会再生产危机。中国互联网行业盛行的“996”工作制导致超过三分之一的从业者因工作压力推迟婚育计划,这种状况不仅损害劳动者福祉,从长远来看还将对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数字劳动的异化正在从多个维度重塑着当代社会的运行逻辑,其复杂影响亟待更深入的研究和反思。

参考文献:

- [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21).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he role of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in transforming the world of work.
- [2]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6). Independent Work: Choice, Necessity, and the Gig Economy.

- [3] Graham, M., & Anwar, M. A. (2019). The global gig economy: Towards a planetary labour market? *First Monday*, 24(4). <https://doi.org/10.5210/fm.v24i4.9913>
- [4] 姚建华. (2022). 数字劳动研究的理论、议题与展望. *新闻与传播研究*, 29(5), 5-22.
- [5] Fuchs, C. (2020). *Communication and capitalism: A critical theory*.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 [6] 周延云. (2021). 平台经济中的劳动异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研究*, (4), 88-99.
- [7] Smythe, D. W.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3), 1-27.
- [8] Terranova, T. (2000).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18(2), 33-58.
- [9] 张雨薇. (2022). 虚拟恋爱游戏的劳动逻辑. *传播与社会学刊*, 39, 43-58.
- [10] Fuchs, C. (2014).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Routledge. ISBN: 978-1-138-94424-4
- [11] Chan, J., & Pun, N. (2020). Digital discipline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241, 1-20.
- [12] Trebor Scholz.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M].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 [13] Shade, L. R., & Porter, N. (2008). Globalization and the Gender Digital Divide. *Signs*, 33(3), 603-625.
- [14] 曹晋, & Murdock, G. (2013). 中国出版业中的性别政治. *传播与社会学刊*, 25, 1-24.
- [15] 姚建华. (2019). *数字劳动: 理论、实践与批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6] 谢芳芳, & 燕连福. (2017). 数字劳动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8, 89-97.
- [17] [黄再胜. 数字劳动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拓展[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04-27.
- [18]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19] Gillespie, T. (2010).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s". *New Media & Society*, 12(3), 347-364.
- [20] Rosa, H. (2013). *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1] 陈龙. (2021). "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 *社会学研究*, 36(3), 26-45.
- [22] 庄家炽, 等. (2022). 平台算法如何影响骑手的工作实践. *社会*, 42(2), 71-95.
- [23] 王斌. (2020). 数字时代的工作时空重构. *新闻与传播研究*, 27(5), 34-52.
- [24] Wood, A. J., et al. (2019). Good gig, bad gig: Autonomy and algorithmic control in the global gig economy.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33(1), 1038-1057.
- [25] Spreitzer, G., et al. (2017). Work design for the digital era.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8(1), 34-49.
- [26] 马克思. (2004). *资本论(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 [27] Zuboff, S.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PublicAffairs*. pp.298-301.
- [28] Srnicek, N. (2017). *Platform capitalism*. Polity Press.
- [29] 中国社科院. (2021). 中国互联网从业人员工作生活状况调查报告.

On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in Digital Labor

Zhang MeiJua

(Xtang 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Abstract: Modern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5G, and AI, have propelled humanity into the digital age, where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digital product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primary modes of human existence and lifestyle. While "digital labor" is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structure, it is also exacerbating the issue of labor alienation. The logic of capital deepens the degree of alienation through the commodification of data, algorithmic control, and spatiotemporal exploitation, leading to a fourfold alienation of laborers from their labor products, the labor process, their species-essence, and social relations. Digital platforms appropriate user data without compensation, algorithms meticulously manage the labor process, and mobile internet blur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work and life, leaving global platform laborers facing a lack of rights and a crisi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Based on Karl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from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this study reveal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roots of alienation in digital labor,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labor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digital labor; labor alienation; algorithmic control